

PROSPECTS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153
专栏

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国际的视角（第一卷）

特邀主编

ZEHAVIT GROSS & E. DOYLE STEVICK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

Vol. XXXX, no. 1, MARCH 20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展望. 153, 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国际的视角. 第 1 卷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 华东师范大学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675-1051-7

I. ①教… II. ①联…②华… III. ①教育—世界—丛刊
IV. ①G5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355 号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总第 153 期

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国际的视角(第一卷)

编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译者 华东师范大学
策划组稿 王 焰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马秀群
责任校对 王 溪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2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051-7/G·6734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及材料,由作者自行负责,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文章中所用名称及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一切信件请寄:

Editor,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E-mail:ibe.prospects@ibe.unesco.org

欲了解国际教育局的计划、活动及出版物,请查询其互联网主页:

<http://www.ibe.unesco.org>

一切订阅刊物的来信请寄:

Springer,

P. O. Box 322,33 AH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中文版项目编辑:

王国红

合作出版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国际教育局(IBE)2009 年

P. O. Box 199,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and Springer,

P. O. Box 17,3300 AA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ISSN: 0033 - 1538

《教育展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Clementina Acedo

编委会成员

Norberto Bottani, Mark Bray

Kenneth King, Tatjana Koke

P. T. M. Marope, Mamadou Ndoeye

Fernando Reimers, Bikas C. Sanyal

Crain Soudien Alejandro Tiana, Buddy J. Wentworth

Joseph Zajda, Yassen N. Zassoursky

Muju Zhu

助理主编

Simona Popa

助理编辑

Brigitte Deluermoz

中文版编委会

主 编

俞立中

副主编

杜 越 陆 靖 周南照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磐 王斌华 冯大鸣 任友群

庄辉明 杜 越 李月娥(Molly Lee)

杨光富 陆 靖 范国睿 周南照

郑太年 郑燕祥 赵 健 赵中建

俞立中 祝智庭 董建红 程介明

编辑部主任

赵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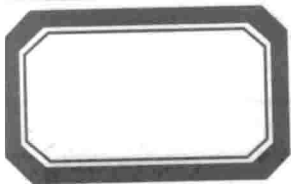
副主任

丰继平 杨光富(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展望》中文版编辑部



第 153 期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第 40 卷, 2010 年 3 月 第 1 期

中文版 2010 年第 1 期(总第 153 期)

目 录

编者按

大屠杀历史、记忆及人权方面的经验教训	<i>Clementina Acedo</i>	1
来自埃利·威塞尔的信	<i>Elie Wiesel</i>	4

观点/争鸣

探寻大屠杀教育与人权教育之间的关联	<i>Monique Eckmann</i>	6
-------------------	------------------------	---

专栏/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国际视角

大屠杀教育——国际视角:挑战、机遇与研究	<i>Zehavit Gross & E. Doyle Stevick</i>	18
实施大屠杀教育和批判公民教育的挑战与可能: 重新审视一项基于小学 5 年级双语班的人种志研究	<i>Louise B. Jennings</i>	37
奥地利大屠杀教育:充满矛盾的复杂历史	<i>Heribert Bastel, Christian Matzka & Helene Miklas</i>	60
有效的犹太大屠杀教育项目:为穆斯林学生占主体的悉尼公立学校而创设	<i>Suzanne D. Rutland</i>	81
以色列犹太学校的大屠杀教育:目标、困境及其挑战	<i>Zehavit Gross</i>	99
波兰公立学校的大屠杀教育:介于记忆和公民教育之间	<i>Boguslaw Milerski</i>	121
德国关于奥斯维辛及其之后的教育:以欧洲为背景的记忆理论	<i>Reinhold Boschki, Bettina Reichmann & Wilhelm Schwendemann</i>	139

动向/案例

大屠杀的历史与人权:1970—2008 年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大屠杀教育的跨国界分析	<i>Patricia Bromley & Susan Garnett Russell</i>	161
--	---	-----

致谢		184
----	--	-----

大屠杀历史、记忆及人权方面的经验教训

Clementina Acedo*

在线出版时间:2010年6月2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0 年

世界各地大屠杀教育是与当代政治争论和地缘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的。反犹太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目前冲突使他们在情感与政治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教师和其他参与教育的人有可能感觉不太好处理这一主题。

大屠杀教育的倡导者甚至在该主题的基本概念、课程中的位置以及在教学中的重要性等方面观点各不相同。由于历史及语境,欧洲各国主要聚焦于大屠杀历史的教学。然而,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正试图形成更国际化或世界社会的视角,教育的主题与公民教育更密切相关,并与普世人权教学结合起来。在本期中,Bromley 和 Russell 的文章、Eckmann 的文章均阐述了这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大屠杀教育经常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这并不是根据其历史重要性,而是把它作为引导个体和集体的行为,来反对目前及未来对大屠杀产生的偏见。大屠杀的经验教训如有助于保护人权,并能抵消常见的划分阶级、残疾、种族、信仰、性别和性取向等方面的敌意和歧视,将能取得很大的贡献。大屠杀的研究在学校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当的吗?

本期特刊有几篇重要的稿件,它们有研究者的新的见解,这些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对大屠杀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征稿启事发出后,编辑部收到了 30 多篇稿件,这些高质量的稿件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因此,我们决定连续两期均刊登大屠杀教育同一主题的文章。这么多人对大屠杀教育感兴趣并有这么多新的研究成果,这很好地证明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及未来研究的挑战。

大屠杀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随所教的民族及地点的不同而发生不断的变化。当大屠杀被看作灾难性和毁灭性事件的时候,它就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受人们广泛研究和记录的种族灭绝事件,因此它能为和平倡导者们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因为联

* 原文语言:英语

Clementina Acedo

通信地址:IBE-UNESCO,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电子信箱:c.acedo@ibe.unesco.org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使命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构建和平的理念”。因此,本期的文章把来自学校和课堂的实践直接带给读者,这不仅是为了欧洲各国,也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权与和平教育。

Primo Levi 是意大利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我们不可能理解大屠杀,但我们能够并且必须了解它产生的根源,并随时警惕,以免它卷土重来。20 世纪末期及 21 世纪初期不断发生的种族灭绝表明,大规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并未使我们感觉到安全。要确信关于大屠杀原因的教育能够阻止未来此类事情的发生,并有助于说明促进这种研究背后努力的紧迫性。全球化和移民潮不断加剧,很多国家的文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兴的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可能使人们想起导致大屠杀的事件。因此,要强调这一教育使命的紧迫性。鉴于当前全世界不断改变的环境,在这样悲剧性事件之后,这么多大屠杀幸存者(连同他们的记忆)的逝去以及对有效教育的极大希望将会成为一股变革力量,这种对可怕的种族灭绝的系统研究会有一些引人注目并有价值的见解。

联合国第 60/7 号决议指定 1 月 27 日作为每年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决议督促成员国开发相关的教育课程,用大屠杀的经验教训来教导未来的一代,以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种族灭绝事件。这些努力正在世界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实施,这需要进行认真的检查。

另外,对大屠杀教育的规范性问题也进行了较多的争论:大屠杀的经验教训应该是什么?谁应该学习?在什么年龄段学习?大屠杀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这一点值得注意。是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其他的种族屠杀,还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已知的少数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些激烈争论和道德辩论中,事实上对正在发生冷静的研究既要通晓这些讨论,同时为现实经验打下基础,这都是必要的。本期《教育展望》提供了大屠杀教育在世界各国教室里面的实践及现实政策的实证研究。

最后,讨论“大屠杀”这个单词的本身意义是非常恰当的。众所周知,全世界人类超过半个世纪都遭受了令人悲伤的屠杀事件。本期的一些作者已经对“大屠杀教育”这一术语提出了质疑,并根据这一歧义提出了免责声明,或者用其他语言提出可能更恰当的术语。但我个人认为,含有矛盾内涵的“大屠杀教育”并不好加以界定,因为它缺乏分析能力。本期中,Eckmann 提出,因为这个术语含有神学的内涵,并缺乏分析意义,因此,它可能更加使人感到困惑而不是清晰。它也被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广泛使用。更常见的是把大屠杀看作是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但它也可能包括针对吉普赛人、罗姆人、波兰人、俄国人、同性恋者、共产党员、残疾人以及纳粹政权统治下人们的谋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找不到它适合含义的原因(Heyl, 1997a, cited in Boschki, Reichmann and Schwendemann, in this volume)。说法语、德语和希伯来语的人更喜欢用“Shoah”(意思为“大屠杀”)一词,它和希伯来语中的“catastrophe”(大灾难)是同一个意思。还有人更喜欢用“hurban”,它和意第绪语中

(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译者注)的“catastrophe”(大灾难)也是同一个意思。很多人也喜欢用“genocide”(种族灭绝)这个词。德国自从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作了关于《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的著名演讲后,术语“教学之后及关于奥斯威辛”(teaching after and about Auschwitz)已能够代表抵制“残暴”一般的努力,同时它也是一种学习并了解全球视野下欧洲人权的方法(根据 Boschki 等人的观点)。

在这里,我对特邀主编 Zehavit Gross 和 Doyle Stevick 所做的工作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与 Reinhold Boschki 的共同努力引起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对本期文章的注意。我也感谢埃利·威塞尔的慷慨和热情,他在来信中非常欣赏这项工作并深信教育的作用,他的话语比我所说的更有说服力,他说:“无论对我们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这些基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反应,教育一定是回应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

(杨光富 译)

来自埃利·威塞尔的信

Elie Wiesel*

在线出版时间:2010年6月9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0年

我刚刚读完本卷《教育展望》所要刊登的文章,他们在道德伦理和研究水平方面都非常好。祝贺所有作者作出如此杰出的研究成果。

文章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来自以色列、德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和非犹太的研究者们携手合作共同关注大屠杀这一主题。有什么比这个尝试更有用?或者,为什么不说它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项目呢?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都致力于同样非常好的关注:认识这邪恶的事并揭开其真相,驱除其有毒害的能量——这是人们所讨厌的,然后努力地去了解它,使人们明白大屠杀难以理解的性质及其内容。

每一篇文章都以自己特有的方法,通过逻辑系统来叙述关于大屠杀的内容,让人感到极度的痛苦。这对我来说,应该视为一个目标,那就是摆脱把人类与他们的命运加以割裂的社会。

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深信教育的作用: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的了,无论对我们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这些基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反应,教育一定是回应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

事实上,在历史记录中,当一个前所未有的悲剧发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容易

该信最初用法语写的,写好后寄给了 Reinhold Boschki。

* 原文语言:法语

Elie Wiesel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是一名小说家、散文家,同时也是一名大学教授。他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出生于罗马尼亚锡格盖特(Sighet)的犹太人聚集区。他是198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58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夜》,该书是对他在集中营亲身经历的回忆。他已经撰写了40多本著作,其中一些著作是以大屠杀为基本素材,他因此成为人权孜孜不倦的代言人。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是纽约城市学院犹太研究的特聘教授。自1976年以来,他成为波士顿大学“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 Mellon)人文学科教授。他也是总统自由勋章、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大克罗地亚共和国荣誉勋章的获得者。

通信地址:Elie Wiesel, Center for Judaic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147 Bay State Road, Boston, MA 02215, USA

电子信箱:reinhold.boschki@uni-bonn.de

的。我们如何把这样恐怖的事情告诉年轻的一代，且不用冒把他们的梦想变成梦魇的风险？我们如何使他们的生活免于忧郁或懊悔的充斥？

然而，我们必须尝试，这是唯一的选择。

话虽如此，人们不可能，将来也不会回答本期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然而，它们却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语是：记忆。这难道不是与我们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学生联系在一起的吗？寻找其中的感觉，近的或远的，这些为何总是伤害我们？

你们都知道我坚信德国战后代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肩负那些令人恐怖记忆的负担。这一代的德国年轻人应该得到我们的鼓励。

在学术语境中，来自以色列或其他地方犹太青年的鼓励能产生一个友好团结的气氛，这能为其他人和偏远的社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会让他们远离充满痛苦与恐惧的过去。

如果新一代用他们的勇气、好奇、热情，让这个怨恨变成丑陋而无用，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来宣布这一伟大并真正有希望的消息。

（杨光富 译）

探寻大屠杀教育与人权教育之间的关联

Monique Eckmann*

在线出版时间:2010年5月8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0年

摘要:大屠杀教育能否成为人权教育的一种手段?如果可以,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在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之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同时也引起了政治家、教育规划师、纪念馆负责人的极大兴趣。而对此问题的反应显然是肯定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也都在这个方面有着巨大的期待。然而,工作在这两个领域的教育者发现,很难在同一种计划方案里同时囊括这两个主题。本篇论文阐明了一些相关大屠杀教育和人权教育的基本概念,并且在相关人权知识的学习、为了人权而学习和在人权背景框架里学习这三个维度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指明了大屠杀教育作为人权教育的一种手段在以上三方面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同样,正因为大屠杀教育和人权教育这两个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演变方式,共同的项目研究能将这两方面的相关概念和经历结合起来,以便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人权教育 大屠杀教育 公民教育

本文是基于2009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大屠杀时代里相关资产的会议中发表的一篇论文而写。

* 原文语言:英语

Monique Eckmann(瑞士)

社会学家,瑞士西部应用科学大学(日内瓦)社会工作学院的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和发表作品集中于跨文化教育、反种族主义教育、人权教育和大屠杀教育这几个领域,以及承认政治学、教育学对于全民充分享受公民权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她是大屠杀教育、纪念和研究国际合作专责小组里的教育工作小组的瑞士代表之一。近期出版物包括:2009年,她和Sebeledi、Bouhadouza Von Lanthen以及Wicht合作由日内瓦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种族主义事件: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的抗议、困境和诉讼》(Eckmann, M., Sebeledi, D., Bouhadouza Von Lanthen, V., & Wicht, L., 2009);2004年,由日内瓦出版社出版的《为记忆中的冲突与对话正身:跨党派集团与特殊群体的孰赢孰输》。

通信地址:Haute école de travail social de Genève, HES - SO,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estern Switzerland, 28, rue Prévost-Martin, Case postale 80, 1211 Geneva 4, Switzerland

电子信箱:monique.eckmann@hesge.ch

引言

大屠杀教育是否就是推进人权教育的一种手段？大屠杀教育是否应该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它又能否成为这样一种手段？作为大屠杀教育、纪念和研究国际合作专责小组(ITF)^①里的教育工作小组(EWG)的成员之一，本人能够力证类似这样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并且这些问题的答案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而这些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明确指出了思考历史是如何能与今天、未来相关联的必要性，以及考虑权利、尊严和充分享受公民权这些问题的迫切需要。

“大屠杀教育”这一短语的表达方式其实是相当模糊的；事实上，正因为这一短语在定义上的不确定性，我在使用这个短语时是十分犹豫的。首先，因为“大屠杀”这一术语有着神学意义上的内涵，且缺乏分析法上的涵义，所以，这一术语有时更多地披上了神秘化的外衣，而不是明确化。法国人更喜欢“Shoah”（浩劫）这一表达方式，它也许并没有更具分析法上的意义，但至少抹去了那一丝带有基督教含义的色彩。同时，“大屠杀教育”这一术语并没有清晰地表明它是否涉及了相关历史、文学和道德问题的学习，是否涵盖了犹太人、纳粹分子和纳粹政治下那些受害者的相关学习。但是，即使此术语并不能准确地阐述它所声称的内容，它依旧有一个制度维度上的含义所在，因此，该术语仍然得到了承认而运用于某些领域。

通常，在政治家、教育策划师以及纪念馆负责人的言语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大屠杀教育(HE)应该成为人权教育(HRE)的一个工具。整个社会在纪念馆、教育计划方案和纪念日这样一些事件上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认为参观纪念馆、实施教育方案、设立纪念日在人权教育和公民民主教育方面，不仅是学习过去的绝佳机会，同时对于未来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每天负责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学生在这个方面都有一种强烈的期待。然而，他们常常认为在一种教学方案、一次参观访问，以及一次活动计划中难以同时实施大屠杀和人权(HR)相关知识的教育。

今天关于大屠杀的“教”与“学”

在我们将大屠杀教育与人权教育相关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大屠杀相关知识的教学的必要性，以及今天关于这方面的教学，我们已经做到了哪一步。我们在瑞士西部采访了一些历史教师关于他们大屠杀教学的经历，并做成了一项调查研究，我报道了其中的一些研究发现(Eckmann & Heimberg, 2009)。我们调查研究

^① 更多信息请见：www.holocausttaskforce.org。

时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与公民教育相关,而不是与人权教育相关;旨在了解这些教师在教学时的感受,以及挖掘出他们在围绕大屠杀这一话题教学时的经历。这些教师声称对于他们而言,在教学里,大屠杀这一主题,即使不是众多主题里最重要的那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一名教师说:“大屠杀,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而这个主题讨论起来十分有难度,但却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在反思我们人类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理解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这场浩劫让教学方案、计划达到了顶点,甚至对一些教师来说,就此点而论,大屠杀这场浩劫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原因。

但是这些教师同样意识到了像这样强烈的观点会给他们的学生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于我而言,大屠杀这一主题并不同于其他的那些主题,谈论它是十分危险的;我尽可能地不把我全部的教学重点都放在讨论这一话题上。”他们还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危险,学生很可能对那些受害者形成一种强烈而刻板的印象——“我担心我们在诠释受害者这一点上会过头……我不想让我的学生感到沮丧。因此,我会涉及受害者起来反抗的一面,让学生们看到一丝曙光。”

以上这些和其他的证据都反映出,对历史教师来说,大屠杀这一主题在他们的课程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担心学生很可能会反对学习相关大屠杀的知识;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绝大多数的公开反对发生在2005年的那一次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60周年的庆典上,当时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一话题。这些历史教师同样仔细斟酌了教学的方法和怎样围绕大屠杀这一主题展开教学。尽管他们深信大屠杀教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屠杀教学会如此重要。

教育工作小组在关于为什么要展开大屠杀教学,实施大屠杀教学的内容,和怎样施行大屠杀教学这几个方面提供了相关指南,并给出了一些建议。^①其中表明(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最难以诠释的部分是为什么要开展大屠杀教学。

类似“你为什么总是谈论犹太人?”“我们为什么不讨论相关卢旺达、奴隶制,或者罗马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又或者,对于苏联的一些国家,学生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探讨一些关于古格拉(苏联的劳改营)的知识?”对这样一些问题,教师发现要回答起来其实是十分有难度的。在西欧国家,我们发现教师针对以上这样的问题会采取新的策略来回答。通常,在低年级的大屠杀教学里,教师会将大屠杀这一主题放到二战以及纳粹主义的产生这样一种语境下来展开讨论。然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年级的教师,则倾向于将大屠杀这一主题与种族灭绝相比较,以及放到与种族歧视、极权主义、殖民主义这些话题中进行探讨。

① <http://www.holocausttaskforce.org/education/guidelines-for-teaching.html>.

聚焦历史还是聚焦回忆？

在一些拉美国家，历史与回忆之间的那道界线是明晰的，是被人们所强调的。大屠杀相关知识的学习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历史上，而不是回忆上，这正如它最初的目标在于知识的习得，而不是纪念。而涉及纪念馆的参观、当地遗址的探寻和当时目击者的访问，又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教师都想让他们的学生感同身受地去体会那些受害者的遭遇，这也是一项基本的要求。但是，为了让学生获得这样一种理解，在一件更为重大的事件下，从个人或者家庭所扮演角色的经验到他们自己所在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经验，以及从整体上去把握大屠杀，实施大屠杀教育的工作者通常需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事件的全貌或者历史性的背景框架；个体所在的国家环境下的具体历史史实；以及与特定地区或社区相关联的有关地方、人物或者纪念馆的详尽知识。

每一个方面都将带来各自不同的益处。相关地点、人物的详细知识的学习易于让学生接受，且能够帮助教师将其阐述得更具体、更形象。对全局的掌握有助于学生将单个的事件或者地点置于整个世界二战、纳粹主义、大屠杀的整体性历史框架之下，以便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战争和种族灭绝之间的关系。了解具体的国家语境大背景下的史实能让学生有机会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反思他们自己所在的社会历史和把握当时整个社会的参与度。然而，大屠杀相关知识的学习还意味着因从其他团体——受害者、行凶者、旁观者、反对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以及了解他们的回忆。通常，这意味着对模糊记忆，甚至是对拒绝回忆的处理。

而这将问题引向了回忆这一概念。对整个社会的记忆能激活对社会里面个体成员的记忆，以此来推动对成员的纪念。但是在欧洲，各种国家或者社会的叙述却不尽相同。我们所接触到的是对欧洲有着呈分割状（零散的）记忆的——按照不同的历史经验而分割成的记忆。甚至在对同一个国家的回忆中，特定团体的叙述也不相同。但是对于这些分割状（零散）的记忆，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能分享这些回忆，并且仔细聆听各种不同的故事。我们有必要根据对回忆的叙述，对整个社会往事的追忆来建立一种复杂的、多角度的视野，以及我们必须彼此识别出受害者的经历和痛苦，并抵制任何方式的否认。在那种多样性叙述的团体里想要获得这种联合是不容易的。

在这种语境下，针对一种常见的误解提出异议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误解是大屠杀教育最初应是对人的回忆负起责任。事实上，起初大屠杀教育是对历史负责的：有义务去传承历史、学习历史。人们过于强调回忆与纪念的责任，并且一些学生对此的态度也是十分消极的。即使大屠杀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保有对受害者的回忆，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纪念的含义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纪念是对死亡者的悼念，且保留只属于那个团体的特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纪念是对个体独有的历史负责。我的意图不在于反对聚焦回忆和聚焦历史，也不在于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而是强调区分这两者的必要性,以及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下如何同时兼顾回忆与历史。

此外,我们必须学习并研究《历史的记忆》:正确把握特定的语境以及尊重历史的决定来设立纪念日是相当重要的。哪一些拥护团体率先提出纪念的场地和纪念的日期,什么时候提出以及又是为谁而提出的?什么样的团体专注于纪念政治学?什么样的受害者可以被命名,谁可以出现在官方认可的纪念名单中,谁又不被包括在内?

聚焦历史还是聚焦历史教训?

另一种误解在法语里是这样说的:“Trop de morale, pas assez d'histoire.”即过于注重从道德中引申出来的教训,而忽视了历史本身,也就是说,相比历史知识本身而言,更倾向于重视历史所带来的教训。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大屠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许多教师或者教育工作者想要总结出有关道德上的教训,然而这些教训往往并不总是正确的。

同样,历史并不是直线式地转换到现在。例如,将纳粹主义、大屠杀与学习相联系,学生会产生同时代的一些刻板偏见,并且认为他们现在就能预见这些偏见将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发生。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太过肤浅,刻板偏见自身并不一定会导致种族灭绝。在这个例子中,学生依靠自己个人的情感,并且情绪过于波动,以致不能将其与政府允许的谋杀机制相联系来思考。

另一种危险则潜伏在那些不了解历史却执意要从中总结出教训的人(或者不懂得精确而具体的历史性组成部分却仍旧要将其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的人)中。当然,想要深知一切有关大屠杀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有可能,人们一定要基于历史的原始资料谨慎地传授历史教训。一旦学生清晰地了解比较什么、怎样比较和为什么要比较,他们就能对事物进行比较。比较,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要求合理地运用自身的知识和相关工具。并且,比较不是使事物相等同。明确比较什么同样重要,例如,将依法处置与目标群体相比较,或者将依法处置与意识形态的环境相比较,或者将依法处置与目标群体的限定和排除的方式相比较。

大屠杀教育(HE)里的人权教育(HRE)意味着什么?

结合背景,不难知道大屠杀相关知识的学习,就本身而言,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现在,我想问:大屠杀教育能否变成人权教育?

人权教育同样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主题。它涵盖了人权观念的历史,《世界人权宣言》(UDHR)的历史,各项公约和他们执行更多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内容,人权文化、理念,以及包含理解和维护人权、抵制侵犯人权的教育学和激励层面的内容。

学者常常明确区分人权教育里的两大方面(Lohrenscheit, 2002):学习关于人权的知识,和为了人权而学习。最近,又确立了第三个,在我看来也是同等重要的维度:在人权的背景框架里学习。

人权相关知识的学习,为了人权而学习,在人权背景框架里学习

接下来,详尽地阐述这三个维度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人权相关知识的学习涉及认知层面。它包括人权历史的知识、人权委员会制度层面的知识,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知识,例如,官方的报道和政府的责任,公民社会的报导和可能的干预措施,以及游说和媒体工作。它还牵涉到人权法律、制度体系和人权侵犯两方面的意识。在人权相关知识的学习这个维度,重点在于了解它、理解它和评价它。

第二,为了人权而学习包括动机方面的内容和各项能力的发展,像对我们每个人所生活的社区或城市的拥护。为了人权而学习意味着能够了解权利,能够辨别违背各项权利的行为,以及学会维护和重新确立各项权利。为了人权而学习还包括明确个体自身的权利,这需要我们追求尊严、团结一致地去尊重、捍卫他人的权利。因此,激励的机制与举措是人权教育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人权教育同样也指发展各项能力举措和学习一些策略,如游说和宣传。在此维度里,重点在于尊重、责任和团结一致。

第三,在人权背景框架下学习意味着不仅要重视内容的学习,还需要重视在人权的各种考虑下形成的学习过程和条件。学习的过程必须连贯,应将学习内容和在此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教育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情境相联系。从教育学这个角度来考虑,它要求教师采用灵活的教学策略,比如“做中学”、同伴教育。而这个教育的过程一定要保证对人权的尊重,对把儿童纳入此学习框架之下的权利的尊重,和对所有儿童和学生的尊重。例如,确保所有儿童和学生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至少保证部分地方无证劳工(非法移民)子女的权利。

那么,用大屠杀教育来实现以上这些维度的可能性是什么?局限性又是什么?我将逐个进行探讨。

大屠杀教育语境下的人权相关知识的学习

在第一个维度里,大屠杀语境下的相关人权知识的学习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在此,我列举三个:第一,二战和联合国关于《世界人权宣言》及种族灭绝公约方面的决定之间的联系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学习《世界人权宣言》历史,相关种族灭绝公约的讨论,以及它们在制度、司法和哲学方面的内容。学生还能了解到儿童权利的侵犯,并学会采取行动去维护这些被侵犯的权利。比如,在 Janus

Korczak 的记忆中,就曾建立相关联盟来大面积地帮助大屠杀后生还下来的儿童及维护儿童的权利。^① 第二,学生能够在通常被称作“三代人权”,也可指《世界人权宣言》的讨论下,学会思考大屠杀在哲学、历史层面上的涵义,且懂得处理来自个体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三者的不同。第三,大屠杀相关知识的学习让人们了解到无数纳粹分子侵犯人权的极端例子,以此来提高人们对种种侵犯的意识:个体财产所有权的侵犯,行动自由权的侵犯,个人所在州的受保护权利的侵犯,甚至是生存权的侵犯。历史同样也包括来自充当旁观者身份的国家的侵犯,即拒绝给予受庇护或者受保护的权利,不能维护人性尊严,否定公民权利的获得,不能保护个人不遭其他州的迫害。毋庸置疑,大屠杀教育让学生见证了保护人权的必要性。人们不能过于单一直线性地来看待大屠杀与人权之间的联系,这是因为比起对大屠杀的讨论,相关人权的争论开始得更早,且早已做出了许多努力,像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权利法案》(又名《人权法案》)。但是,关于大屠杀的历史经验和知识使其人权的基本概念得以重新确定,全世界范围内信奉人权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广泛应用。在大屠杀教育里,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关系因人权的极端侵犯而愈加突出。

在人权相关知识的学习这个维度里,我们可以采用 Hannah Arendt 的一项关于如何识别至关重要的权利的表述语来总结:拥有权利的权利。犹太人的命运确实足以表明那些完全否认权利的无政府人士的极度脆弱性。唯有政府能够确保人们有权拥有权利,以及维护人们及其权利和尊严。为此,必须使全人类充分享有公民权。

这里的局限在于所有以上这些话题的讨论都只能在大屠杀教育的背景框架下展开。并且,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想要通过大屠杀的教学或者纪念馆的参观来更深地挖掘它们是十分困难的。

大屠杀教育语境下的为了人权而学习

第二个维度,在大屠杀教育中为了人权而学习,我们提倡通过学习宣传和干预的措施来维护人权,并且建立或重新建立那些已经被否认的权利。这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验、态度和行为模式,以便他们将其运用到具体案例、违反记录、组建网络、尝试游说等等之中。这些活动让我们想起了著名瑞士教育工作者 Johann Pestalozzi 的话语,他秉持运用“头、心和手”的方法去学习。所以,手同样意味着行动。

但是,这个为了人权的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学习的维度在大屠杀教育里存在局限性,且不容易实现。原因如下:第一,大屠杀作为侵犯人权最极端的例子,不仅仅只是吸收如何防止歧视,如何与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或者如何维护人权的经验教

^① Korczak 是波兰裔犹太人,儿科医师,教育学家,基于对儿童及儿童权利的尊重,他在华沙犹太人区他自己的孤儿院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方面的视角。尽管人们曾对他提供救援,但他拒绝抛弃那些儿童独自离去,而和那些儿童一起被带到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全都遭到了谋杀。

训。同样,大屠杀教育并不直接为采取行动和干预措施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如游说和宣传)提供尝试的机会。当然,学生可以想想种种反抗和抗争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都必须处于政治局面(包括国家暴力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当中的例子。一些教师更是基于国家社会主义时代里所发生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促进人们反思为人权而开展的行动,阐明了人权的两难困境(或者说人权困境产生的局面)。学会处理对这些困境的不同看法(例如,行凶者、受害者、旁观者、救助者以及反抗者的视角)既是我们形成道德判断的一种途径,也是我们考虑采取行动的第一步。

大屠杀教育语境下的在人权背景框架里的学习

第三个维度,大屠杀教育语境下,在人权背景框架里学习既指依据人权原则过程的注重、氛围的营造和教育学框架的建立,也指法律和公民框架体系的确立。同样,根据人权原则,我们应当维护儿童和学生的合法权利,保证每一名儿童的受教育权,以及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以此来确保机会的平等和民主模式的建立。

另一方面,在人权背景框架里学习还涵盖了学习系统中的人权观、活跃的学习情境,以及一种民主的教学方法。而同伴教育对于人权教育而言,也是一种基本的手段:正如 Jean Piaget 所说,相比我们的父母和教师,我们的同伴对我们道德判断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这些教学的途径一定要给学生空间来反思他们个人或家庭成员所经历到的权利的维护与侵犯和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不管是个体自身遭受到歧视,还是个体目击身边其他人遭遇歧视,个人的亲身经历都足以激发起强烈的学习欲望。而在学习大屠杀相关知识、参观纪念馆,或者观看相关影片的过程中,这样类似的经历和场景常常浮现在学生的脑海中,也正是它们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过去的不公平待遇与现在的种种歧视之间的相关联系。

大屠杀教育能否成为人权教育的一种手段?

它又是否应该成为这样一种手段?

首先,大屠杀教育能否成为人权教育的一种手段?我认为关于大屠杀的教育是不能完全满足人权教育的需要的,但是它的确能十分有效地推动人权的教育和促进思想的解放。然而,人权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在大屠杀教育里,主要还是通过关于人权知识的学习和在人权背景框架下的学习这两个维度来实现的。

大屠杀教育为处理人权问题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是它的一个起始点。尽管要实现在大屠杀教育语境下做到真正为了人权而学习是相当有难度的,但是,对于学习一些人权的相关知识和在人权背景框架下学习,大屠杀的教育还是至关重要的。在绝大多数大屠杀相关知识的教学中,教师仅仅只是少量地提及了人权的那几个维度,然而不管是在谈论大屠杀这一话题之前、之后,或者是在其他情境下,我们都应